

抗战初期的“三厅”文艺团体

李莉¹ 唐忠新² (1.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530022 2.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 530022)

摘要:抗战初期,在武汉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政权机关。武汉的救亡歌咏运动的高潮就是在“三厅”举办的各宣传活动中产生的,“三厅”广大的音乐工作者们在武汉时期也为中国抗战文艺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是对抗战初期“三厅”文艺团体的初步研究,并论述“三厅”文艺团体在历史上的贡献。

关键词:“三厅”;抗敌演剧队第九队;孩子剧团;歌咏

“三厅”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政权机关。1938年4月1日在武汉成立,武汉沦陷后,“三厅”辗转南撤到桂林,在桂林经过自主改组后西迁重庆,1940年秋,在国民党地破坏和迫害下被迫改组,旋即结束。第三厅是宣传厅,掌管宣传事宜。虽工作不限于搞文艺工作,但它却领导了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也因此对于国统区的抗战音乐运动的开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以在武汉期间的成绩最为卓著。武汉的救亡歌咏运动的高潮就是在“三厅”举办的各宣传活动中产生的,“三厅”广大的音乐工作者们在武汉时期也为中国抗战音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即对抗战初期“三厅”文艺团体的初步研究,并论述“三厅”文艺团体在历史上的贡献。

在抗战初期,武汉云集了“抗日宣传队、救亡演剧队、文化工作队、战地服务队等一、二百个群众团体”^[1]和300多个歌咏团体,也是因为有些团体的积极响应,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三厅”掀起了武汉如火如荼的抗日宣传活动。但是由于他们是民间组织,不仅经费困难,而且没有政治上的保证,在宣传工作中常受到国民党的滋扰甚至是迫害。尤其是随着战事的不利发展,迫害也益发嚣张。直至在1938年8月,国民党强行解散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三个团体,作出“公然违背民族团结、违背抗战利益、违背民族利益的举动”。

对于这些抗日的青年,党是十分关心的。在中共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陆续地将一些抗日青年送往延安。并且在“三厅”成立之初,周恩来同志就曾高瞻远瞩地考虑应将汇集到武汉的各地抗日青年和民众团体、演剧队、宣传队等组织起来,以“三厅”的名义成立演剧队和宣传队。经过与国民党的周旋、斗争,最终在9月初“三厅”陆续成立了10个演剧队、4个宣传队,再加上原隶属的“孩子剧团”,组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的烽火文艺兵。

这些队伍自成立起,就利用一切艺术形式,包括演剧、歌咏、美术、文字等,进行抗日的宣传活动,为抗战文艺发展和抗战文艺宣传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主观情思和客观物象相结合的产物。“心象”因人而异,在具体的艺术表现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不同的艺术家对同一艺术语言的把握采取不同的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具体而言,朱耷对眼中的物象进行抽象化、符号化,力图用最简朴的“形”去承载他最难以言说的心灵世界。同时,他还随着自己的心对这些心象进行改造、重塑、扭曲、变形、夸张。在他的画中不管是“白眼向人”的鱼,拳足敛羽、忍饥耐寒的鸟,恣意生长的荷花,还是那比例失调的畸形的兔子和块状拼合的猫,倒锥形一触即落的巨石,这些超常的物象都是他“心象”映照的结果,抒写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慨,表现他那倔强傲岸的性格。从朱耷成熟期的《荷花双凫图》与徐渭的《墨葡萄》相比较可以发现,朱耷简练而含蓄的笔墨,高度符号化的物象造型,虚灵的空间布局,透射出的是一种虚疏淡泊、冷逸逼人的气氛。而徐渭《墨葡萄》则在酣畅淋漓的水墨中透出的动荡不安的气氛。总的来说,同样是怀着浓重、炙热的情感,但朱耷表现出来的是清新而稚拙,整体气韵是内敛而静态的,而徐渭的画风则显得粗犷放肆、激昂

一、关于抗敌演剧队第九队的情况

抗敌演剧队第九队是“三厅”文艺队伍中的一支,相对与其他以“演剧为主”、“歌咏为辅”的演剧队,“九队”的文艺宣传与音乐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抗战初期的武汉是一个歌咏之城,三镇至少有300多个的歌咏队,许多歌咏团体都由专业音乐家如冼星海、张曙、任光、江定仙、沙梅、王云阶、盛家伦、林路等亲临指导,因此进步很快,有的已具有较专业的演唱水平。演剧九队就是有这些歌咏队员组成的。1938年8月,“三厅”原本计划筹建4个抗敌歌咏队,由音乐工作人员冼星海、张曙、任光、林路等负责招考队员,队员来源多为进步的歌咏团体如海星、青救等。但是由于国民党的阻挠,抗敌歌咏队未能成立,后“三厅”对于坚决留下的队员坐了如下安排:一、一部分输送到延安;二、分发各演剧队充实歌咏力量;三、原“抗敌演剧队第九队”的队员集体到延安了,由歌咏队顶其番号。因此,“九队”是具有较高歌咏水平的演剧队。

“九队”拥有较完备的声乐声部组合,在武汉时曾演出过《在太行山上》、《洪波曲》、《祖国的孩子们》、《做棉衣》、《丈夫去当兵》、《赶豺狼》、《日落西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歌曲,还演唱了难度较大的四部合唱《抗敌歌》、《旗正飘飘》、《热血》、《歌八百壮士》,以及李抱枕填词的意大利歌曲《我可爱的大中华》等。“九队”队员余雷、徐炜等还多次在音乐会和广播节目中进行独唱演出。

在音乐家冼星海、张曙,戏剧家万籛天、舒强的指导下,“九队”也成长成为一支优秀的为抗战服务的演剧队。曾在冼星海亲自带领下于1938年9月到阳罗、金口一带举行了成功的汇演,节目即包括拿手的歌咏,也包括演剧,并向群众教唱抗日歌咏、出壁报等,进行了各种抗战宣传工作——这些都是“三厅”文艺兵所应具备的综合素质,也是“调动一切手段为抗战服务”口号的实践。

二、关于孩子剧团的情况

在“三厅”浩浩荡荡的文艺队伍中,还有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他们就是蜚声中外的孩子剧团。他们最初是来自上海战区孩子,原是由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个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儿童艺术团体。成立于1937年9月3日,领导人吴新稼。上海沦陷前夕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武汉,并在周恩来等同志的关怀下,加入了“三厅”,在保卫大武汉的音乐宣传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是“三厅”文艺宣传活动中最闪亮一部分。

孩子剧团是最早加入“三厅”的文艺团体之一,因此参加了抗战初期的“三厅”在武汉举行的大部分文艺宣传活动:在“抗战扩大宣传周”,他们参加了庆祝台儿庄大捷的“万人大会唱”、“水陆火炬歌咏大游行”、歌咏日的歌咏游行和歌咏音乐

澎湃。

由以上来看,与其说徐渭和朱耷是用笔墨作画,还不如说是用他们的心在作画,画成了他们情感的寄托之物也是他们人格的写照,正如郑板桥所说是“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3]他们的绘画作品不仅反映了自我,又超越了自我,成为那一时代民族精神的结晶。

注释:

[1]紫都,马刚.徐渭[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66.

[2]伍蠡甫主编《中国名画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852.

[3]转引自王伯敏的《中国绘画通史》(下),北京三联书店,2000,99.

作者简介

熊立,(1974-),女,湖北公安人,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生(在读),研究方向:艺术理论。

会；在“雪耻兵役宣传周”，他们在难民所、茶馆、轮渡上进行宣传，并深入到农村去工作，参加了“五四”和“五九”的歌唱大会；在“抗战周年宣传周”，参加了分区的戏剧、歌咏演出，街头宣传和献金及献金音乐会，参加了“纪念聂耳音乐会”；以及“节运”、“募寒衣”、“征集卅十万封慰问信”等宣传工作。他们幼小的身影闪现在街头、码头、茶馆、舞台、游行队伍，闪现在城市、农村、医院、难民所、工厂，他们演戏、歌唱、演讲、放“西洋镜”、“卖梨膏糖”、写标语、出壁报、访问工人和农民、慰问和运送伤兵……无论在哪，他们都是最引人注目和最感人的团体。在这样的锻炼中他们成为了武汉孩子的中心，中国孩子们的象征。

由于孩子剧团为抗战所作的杰出贡献，他们逐渐成为了大武汉孩子们的中心，甚至成为了中国抗战时期孩子们的象征。在党和“三厅”的领导下，孩子剧团在1938年7月19日，发起“儿童星期座谈会”，将其他的孩子团体和学生们团结在一起，共同研讨武汉儿童抗日救亡工作。参加团体有“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七七少年剧团”、“中华海员流亡儿童团”、“抗救儿童救国团”、“抗战儿童读者会”、“抗战建国剧团”、“青救儿童先锋队”、“青救儿童剧团”、“儿童保育会”、“铸抗儿童歌剧院”、“中国童子军岳武穆队”、“新安旅行团”等。在孩子剧团的领导下，曾在武汉第九小学召开了多次座谈会，探讨了关于战时儿童自救和为抗战服务等问题，并且领导武汉各界儿童举行了各种宣传活动。歌咏音乐活动包括：7月28日下午4时，在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了“儿童露天歌咏大会”。节目分全体合唱，各团体分唱，教师名家演唱三部分，参加儿童有500余人，这是武汉之“空前创举”，也是中国之空前创举。这种团结各界儿童“集体歌咏”的表演形式，在以后的抗战岁月中也被进一步的发展，是孩子剧团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7月30日下午4时，在中山路民教馆举行“儿童联合歌咏大会”，参加儿童有100余人，除有全体合唱和各团体分唱外，还有连环合唱——《保卫大武汉》、《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中国民族不会亡》，并现场向听众教唱抗战歌曲《打倒日本》；8月8日晚，在大智门苗圃平民新村举行“保卫大武汉宣传晚会”，参加者300余人，游艺节目达11项之多；8月22—24日在兴横街广场进行“街头宣传”。

在不断的宣传中，孩子剧团的文艺表演也日益成熟，因此他们也是中国新文艺、新音乐的传播者和传承者。孩子剧团原本只是一群爱唱歌的孩子们，但特定的历史使他们成为担负着救国重任的抗战文艺工作者。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得到长者的无限关爱，“三厅”众多的文艺家们都成为他们的老师。单就音乐而言，由冼星海教孩子们乐理、视唱、指挥；张曙教声乐和发声；沙梅教音乐基础知识等。戏剧和舞蹈等也都有艺术家的亲自教导。因此，孩子剧团的成员们得天独厚地吸收着新文艺的知识，也自然成为了中国新文艺、新音乐的传播者和传承者，为不仅能很好的为抗战服务，也为日后成为新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将文艺送上战场

在抗战初期，文艺界就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以及文化“通俗化”、“大众化”的口号，欲将文化的触角推进到农村和战区，尤其是战区，来服务于抗战。但是由于广大的士兵多为文盲，因此以表演为主的文艺节目，就格外的重要。尤其是演剧和歌咏。“三厅”的抗敌剧团就是最早深入战区的国统区的文艺团体。

抗敌剧团原为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四队，撤至南京时合并为抗敌剧团，经党中央同意加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训处，至“三厅”成立后，改属由“三厅”领导。当台儿庄告捷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抗敌剧团奉“三厅”命令，赴前线慰问演出。1938年4月17日出发，5月中旬徐州被包围后，曾数次企图在津浦北段突围未果，后转辗迂回自鲁南、皖北、苏西北等敌军后方，终于7月9日安然抵汉。这是文艺界首次奔赴前线的行动，也是文艺界“为自由中国而奋斗”的最坚决的体现。其中，艺术家赵曙在这次突围中牺牲，是“文化界第一个死于敌人枪弹下的英勇战士”。

1938年9月初，“三厅”的文艺团体组建完成后，周恩来同志亲自制定了各队分赴战区前线的计划和行动路线，将文艺的触角

深入到了抗战前沿和后方。此次派遣涉及地域十分广泛，几乎覆盖了我国东、西、南方的各个重镇要地。东至江浙、江淮一带，向下可以贯穿至福建；西至陕甘，可与陕北根据地文艺发展相呼应；南至广西，并且可纵深到缅甸一带。派遣路线几乎整个大后方和部分前线，这样规模的文艺队伍的派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虽然由于战争等的原因，各队完成情况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足迹还是基本跨越了中国的西南各省及缅甸等周边国家。

“三厅”的文艺兵正是新音乐运动的工作者，他们所到之处留下的不仅仅是几首歌曲，而是新音乐、新文化的种子。此外这些“三厅”的文艺兵，并不仅仅是在作文艺的汇演，而是坚定的战士，他们承担着宣传抗日的重担。在中华民族的最危难时期，要抵抗强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号召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以人民战争来击溃强悍的敌人。而文艺正是激动人民、发动大众的最有利的武器。散布在各地的文艺宣传者无疑就是这重任的承担和执行者。他们在进行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抗战文艺宣传和文艺发展的中坚力量。

结语

“三厅”文艺团体的历史贡献是离不开党的直接关怀和领导的。“三厅”的文艺队伍是由周恩来同志策划组建和具体领导的，队伍成立后，不仅在艺术上得到提高，而且也武装了思想。周恩来同志为青年们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其中贯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并谈到了艺术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对队员们话“象火把一样，照亮了演剧队员前进的道路，象革命的种子，深深埋在这些青年人的心中生根、发芽、结果。”^[2]此外，各团队都有秘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担任管理工作。因此，从政治上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国统区的宣传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中的重要战略部署。

“三厅”文艺团体的历史贡献也是音乐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以上“三厅”的文艺队伍，虽有不同冠名，但所担负的任务是基本相同的，即应用一切文艺的手段来进行抗战的宣传。在文艺宣传中，音乐是最能感动心灵、刺激人情感，尤其是歌咏，它具有着先天的优势。歌曲一向是抒发人情感的重要形式，有着强大的感染力；号召的、斗争的、愤恨的、安慰的语言，通过抑扬的曲调、统一的节奏，整齐的从众人人口中唱出，具有着无比的力量；歌曲较之其他艺术形式普及性更强，因为明确的语言更容易让群众理解，流畅的旋律便于群众记忆；此外，伟大的时代，也产生伟大的音乐，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受难期，但也是奋发和革新的时机，伴随着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爆发了伟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也诞生了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歌曲等优秀的抗战音乐作品。也正如在新时代的中国诞生了那么多歌颂新生活、歌颂祖国的爱国歌曲，也再没有比“爱国歌曲大家唱”全国歌咏活动，更能体现我们对于幸福生活的赞美，对母亲祖国60华诞的庆贺，对于伟大祖国的热爱！以歌咏为武器，也是由于抗战时期的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难关头，在艰难的岁月中，一切进行艺术行为的物质条件都难以保障，而歌咏，它不需任何的外在条件，只要有人就可以很快地传播。因此，歌咏是“三厅”文艺工作者的重要宣传武器，也是救亡运动中最有力的宣传武器！

“三厅”演剧队、宣传队和孩子剧团，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直是深入在前线和后方城乡，“进行了艰苦卓绝、出生入死”的宣传工作，更难得的是无论在任何艰难环境下，他们都遵循党的领导，坚守革命信念，以歌咏、演剧为武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注释

[1] 阳翰笙. 风雨五十年[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164.

[2] 抗日烽火文艺兵——抗敌演剧队第一队(剧宣四队)的十一年[M]. 中共柳州党史研究室. 1996. 17.

作者简介

李莉(1976—)，女，文学硕士，河南新乡人，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唐忠新(1967—)，男，文学学硕士，湖北仙桃人，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